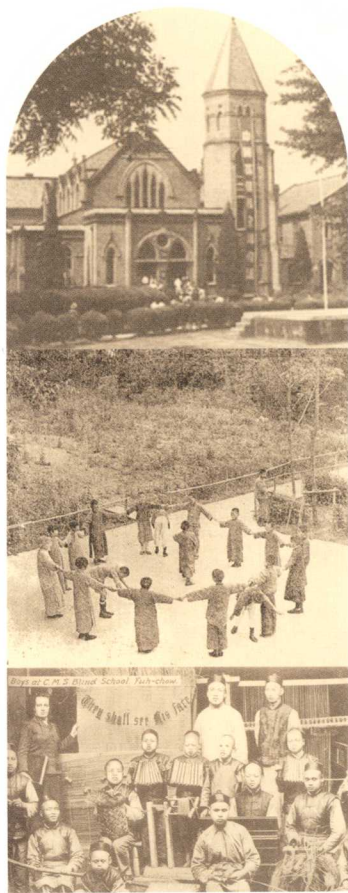




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20th Century

姚伟钧 胡俊修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14040677

B979.2
46



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20th Century

姚伟钧 胡俊修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北航

C1727991

B979.2
46

778040410

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 / 姚伟钧, 胡俊修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95-5010-4

I. ①基… II. ①姚…②胡… III. ①基督教史—
研究—中国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332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62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7.25 字数: 620千字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册 定价: 9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顾问

[美] Milo Hadwin 博士

[美] Thomas Peng 博士

(陈一舟) 第一章

(傅雷) 第二章

(李一舟) 第三章

(李一舟) 第四章

(李一舟) 第五章

(李一舟) 第六章

(李一舟) 第七章

(李一舟) 第八章

(李一舟) 第九章

(李一舟) 第十章

(李一舟) 第十一章

51

章节作者

前 言
第一章 (王 威)
第二章 (彭 剑)
第三章 (陈 显 姚伟钧)
第四章 (赵广军)
第五章 (赵广军)
第六章 (赵广军)
第七章 (蔺建平)
第八章 (张永广)
第九章 (张永广)
第十章 (徐炳三)
第十一章 (程翠英)
第十二章 (张文清)
后 记

目 录

前言 世纪回眸:20 世纪中国基督教发展历程	1
一、动荡中的机遇:基督教传华的“黄金时代”(1901—1922)	1
二、挑战与回应: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全面展开(1922—1937)	4
三、外患与内忧:战乱中基督教会的顿挫与抉择(1937—1949)	7
四、涅槃与再生:新中国五十年基督教的转型(1949—2000)	10

上编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历程(1900—1949)

第一章 武汉基督徒与辛亥革命研究——以美国圣公会为讨论中心	15
第一节 晚清武汉基督徒的时代处境	16
第二节 美国圣公会在汉的宣教事业	21
第三节 基督徒参与辛亥革命的实践	27
第四节 基督徒参与革命原因分析	40
第二章 基督门徒——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美国传教士	51
第一节 教士群像	52
第二节 关爱邻人	59
第三节 和平主义	66
第四节 效法基督	72

结 语	76
第三章 上帝与“恺撒”:中国近代政教关系研究——以基督教与国民党关系模式为中心(1924—1933)	79
第一节 国民革命与基督教	80
第二节 国民党与基督教	89
第三节 国民政府与基督教	96
结 语	108
第四章 中共政权对教会土地改革之研究(1921—1949)	113
第一节 中共政权建设中宗教土地政策的历史考察	113
第二节 教会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政治身份定位	133
第三节 地权变更——教会土地的没收及分配	144
结 语	161

中编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第五章 20 世纪初福州美以美会信徒捐输之研究	171
第一节 美以美会在福建地区的传播及其组织机构	174
第二节 美以美会信徒捐输从基层教会到总会议的集中	179
第三节 捐输的分配:一种规制与灵活的管理模式	184
第四节 基层教会的捐输:两条自养道路的依靠力量	185
第五节 西方差会管理下地方教会的自养之路	190
第六章 上帝之笈——信仰视野与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	195
第一节 时间顺序里的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历史、缺陷、特点及四级教会文字宣传意识的更嬗	196
第二节 空间秩序里的福建基督教文字事业——新闻竞争状态下的教会文字事工、文化状态上的比附意义和时政遭遇	204
第三节 教会文字事业之悖论——赢利与福利、中国籍编辑的传统情结、教会教育的文字扫盲和文字布道对教会及社会之意义	213
第四节 教会文字事业在近代福建的影响	227
第五节 翰墨之缘——教会文字宣传与传统文化的机缘之和	229
第七章 传播上帝的爱与光辉——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的盲人教育	232
第一节 开展盲人教育的社会背景	234
第二节 近代教会盲人教育	246
第三节 教会盲教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意义	271

第八章 基督教大学与 20 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	277
第一节 基督教大学: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77
第二节 基督教大学与近代中国的学科建设	283
第三节 教育理念:基督教大学的精神遗产	297
第九章 构筑心灵长城——基督教会组织与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	304
第一节 基督教与西方近代体育	304
第二节 基督教学校与近代中国的学校体育	311
第三节 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的大众体育	319
第四节 民国时期体育教育中的“女性取向”——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考察	325
第十章 基督教与 20 世纪前期中国风尚改良	336
第一节 承袭与延伸:旧俗陋规改良之再推进	337
第二节 鼎故与革新:新时代弃劣习之新重点	344
第三节 融汇与调适:中国传统礼俗之本色化	350
第四节 顺势与应时:基督教铲恶习之社会化	359
结 语	367

下编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1949—2000)

第十一章 疏离与忠诚——20 世纪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本色化历程研究	371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历程	372
第二节 本色化历程的中国特色	377
第三节 本色化对主的疏离	380
第四节 疏离下的忠诚	383
第五节 荣神益人,至忠至诚	393
第十二章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	397
第一节 基督教对当代中国暨农村社会生态的适应	397
第二节 基督教在农村的兴盛及原因	404
第三节 基督教对农村社会的积极影响	410
结 语	425
后 记	427

前言

世纪回眸:20 世纪中国基督教发展历程

从 1807 年马礼逊将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到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新教在华传播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中它的发展道路并非坦途,官府的压制打击、民间的排外反教、传教策略的失误等诸种因素,使得基督教在 19 世纪的中国步履蹒跚。1900 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不只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或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更重要的是这一年的中国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义和团的刀戈与八国联军的炮火,在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人间的悲歌。从此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渴望日益迫切,而中国基督教会也开始了对自身全面的反省与改革。20 世纪的中国基督教有过辉煌的发展历史,也经历过种种挫折与坎坷,最终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走向了新生。对于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与探讨,我们在此仅融汇前人成果,作一简要的梳理和勾勒,以期为本书各章专论提供一条可资参详的线索。

一、动荡中的机遇:基督教传华的“黄金时代”(1901—1922)

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清政府中最顽固的排外官员被剪除,民间社会的反教力量也严重削弱,这就为基督教的复兴和壮大带来了机遇。此时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包括大厦将倾的清政府也开始了

采用西法的新政。而基督教恰恰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因此受到了新的礼遇和关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国民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人士中,有相当比例的基督徒,他们的开明态度对基督教发展无疑是有利的。而教会人士也开始对自身进行反省,努力排除吃教者,改变传教策略,加大传教力度。再者,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也有寻求宗教安慰的需求。种种因素促使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

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会的传教效率显著提高。20世纪初大批新教传教士来华,1889年新教在华传教士仅有1 296人,到了1906年则增至3 883人,1919年达到6 636人,30年中增加5倍多。这些传教士驻扎在各省的693个地方,在1 037个布道站工作。在这693个中心中,578个(占83%)有一个布道会,442个(占65%)驻有5名左右的传教士。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的省份,17%在长江流域以外的地方。8个驻扎中心,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起来占全部外国人员的26%,2/3的新教传教士住在人口在50 000以上的176个城市。据统计1919年新教在华有6 391个教堂和8 886个“福音中心”。^①这时传教士的传教人群进一步扩大,如对水上居民、人力车夫、邮电职工、监狱犯人、穆斯林等各类人群展开布道活动。^②传教士的布道范围也进一步扩展,云南、蒙古、黑龙江等人烟较少的边疆地区的布道工作受到重视,如早在1907年传教士专门派出传教队展开对黑龙江边境的传教工作。^③

20世纪初新教差会来华数量也迅速增加,1900年中国有61个差会,到了1906年增至67个,13年后的1919年就增加到130个,另外还有36个基督教团体独立经营的各种事业。除了原来欧美教会外,欧洲各国对中国的传教力度有所加强。^④在这些传教组织中,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青年会(Y. M. C. A)是一个国际性的青年活动和社会服务团体,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1885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州成立的。1895年北美协会又在天津组织建立了一个公立学校间的青年会,会员有500人。^⑤此后几十年间青年会在中国各大城市建立,1922年市会增加至40处,校会增加至200处,市会会员总数达53 812人,校会会员总数达24 135人,全国有华人干事550

①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9—181页。

②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68—272页。

③ 王正翱:《黑省布道会最近的情形》,中华续行委员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年第6卷,第77页。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⑤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91页。

人,外国干事 103 人,比较十年前增幅为 260%。^① 同期的女青年会(Y. W. C. A)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 20 世纪初 15 年内在 7 个大城市建立了会所,执行部女董事达到 120 名,中外董事人数相当,会员数量增长十分迅速。^② 男女青年会注重在城市青年、尤其是城市知识青年中开展工作,在社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一批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发展意义重大。1913 年美国青年会领袖、著名布道家穆德(John Raleigh Mott)和艾迪(Sherwood Eddy)来华,在中国 14 个大城市举行布道会合科学演讲会,引发了极大的宗教热忱,当时听讲者累计超过 25 万,志愿研究《圣经》者超过万人,受洗者数量十分可观。^③

这一时期在华差会非常注意联合布道工作。1907 年和 1922 年在华各差会在上海分别举办了两次大型会议,就组织和工作合作问题多有讨论,并初见成效。如 1907 年长老会就成立了全国联合会,后来与公理会、伦敦会联合组建中华基督教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基督教合一组织。全国信义会、圣公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联合。1913 年在穆德的推动下,中国基督教会联合成立了全国基督教的中心机关中华续行委办会,该会经不断完善最终于 1922 年改组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是为中国基督教最重要的领导协调机构,对中国教会的组织建设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④

在内外种种有利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中国基督教展现出蓬勃的生机。1900 年时全国教徒 85 000 人,1906 年即增加到 178 251 人,6 年之间增长一倍,为教徒发展最快时期。到 1915 年有教徒 268 652 人,1919 年为 345 853 人,1920 年总数达 366 524 人,14 年间又翻了一番。从 1900 年到 1920 年的 20 年间,教徒总数增长了 4.5 倍。^⑤ 中国的教会领袖也正在崛起。1907 年大会 1 000 名代表中,其中 500 人为选派代表,没有一名中国职员;而 1913 年开会时,115 名代表中,中国代表就占了 1/3,1919 年和 1922 年两次会议时中外代表已经持平。^⑥

各项基督教事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教育事业而言,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除了恢复以往的教会学校外,又新建了大量新的学校。到了 1916 年,新教教会初小有 5 637 所,高小有 962 所,中学有 291 所,各类学生总数达 179 621 人。^⑦ 此时的教会

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96 页。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第 127 页。

③ 参见[美]马泰士《世界的公民:穆德传》,张仕章译,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 年。

④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15—216 页。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第 139 页。

⑥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第 128 页。

⑦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 179—181 页。

高等教育已经初具规模,高等学校达到14所,基金在600万银元以上,常经费1 222 000元。教育体系中神学教育发展很快,具备了大学学历的学生才能入读神学院。实业教育也受到重视,1907年教会女校中设立职业教育课程的占55%,男校占40%,南京、北京、广州的教会大学以及青年会也尝试开办了实业教育。^①文字事业方面,据1918年统计,基督新教在华的出版物达3 451种,其中书籍1 188种,小册子1 152种,折页和单张1 066种,图表45种。全国主要基督教文字出版和发行机构约30个,宗教报刊从1907年不到20种,增加到60余种。^②医疗方面,这一时期教会除了设立了大量的教会医院外,教会医学院数量也有所增多,比较有名的有1906年创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创立的湖南湘雅医学院及四川华西协和大医学院、1917年创立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等等,为日后的中国医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此期间医科专门学校共有24所,在校注册学生已达两千余人。^③此外,基督教会在社会救济、风尚改良、公益事业等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二、挑战与回应: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全面展开(1922—1937)

20世纪前20年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能够保持下去,而是随着1922年兴起的一场反对基督教的运动而遭遇挫折,这就是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1922年初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第11次代表大会。同年3月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号召青年学生起来抵制这一同盟,得到爱国学生的纷起响应,上海各校学生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1924年8月,上海各校学生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并出版《非基督教特刊》指导和联络各地的运动。南京、苏州、广东、湖南、湖北、青岛、重庆、太原等地也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使之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其后这一运动同收回教育权运动汇合在一起。在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组织的推动下,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了“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议决案,教会学校的发展受到阻遏和限制。该运动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渐渐消歇。^④

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科学、自由主义、人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第128页。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第1204、1248页。

③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第1145页。

④ 参见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文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在中国传播并深入人心的结果。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也是导致非基运动的重要原因。这一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其积极意义不容抹杀,但对于在华传播的基督教而言则是一场灾难。1928年时在华传教士从1922年的8300人降至3150人,即使并未离去的传教士,出于安全的考虑,也由内陆迁至沿岸的大城市,内地的传教活动深受影响。各地教会学校学潮迭起,集体罢课及退学现象十分普遍,1927年时教会中学学生数从1922年的11000人减少到1927年的5500人。一些教会学校为了避免冲突自行关闭,部分学校的校产甚至被地方政府没收。^①

面对非基督教运动风潮,教会人士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基督教被视为一种西方的宗教,不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是导致中国社会排教的重要原因,于是促进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根据著名基督教史学家王治心先生的定义,所谓“本色教会”即“自理自养自传,在经济上、行政上、工作上,都是以中国信徒为主体,西国传教士可以退处于辅助地位”^②。这里“自理”的含义即我们常说的“自治”,基督教本色化的实质就是中国人自治、自养和自传。事实上,本色化的思潮在19世纪就已经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实践^③,并非是非基运动的产物,但非基运动对本色化运动全面展开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非基运动以后本色化运动的成果首先表现在自立运动上。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那时已经出现了自立教会的思想及少数小规模自立教会。^④但是自立教会真正形成气候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的事情了,其中真耶稣会、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等教派最有影响力,而以耶稣家庭最具特色。耶稣家庭是1921年由基督徒敬奠瀛创立于山东的中国本土基督教派别。敬奠瀛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1912年他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读书并受洗入教。在美国传教士的支持下,他于1921年在山东泰安马庄建立教会组织及“圣徒信用储蓄社”,1927年正式成立耶稣家庭。该派要求信徒必须离弃自己原来的家庭,把所有的财产和个人都献给大的家庭,过集体生活。成员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平时男女分居,同衣同食,共同劳动。耶稣家庭以敬奠瀛为最高领导,下设若干部门,宗教与生产生活活动合一。后来该组织在华北等地建立“小家”,尊泰安马庄的耶稣家庭为“老家”,敬奠瀛为“老人”。各小家均有“家长”。该派在日本侵华时期发展较快,1952年在时代的压力下解散。^⑤

① 参见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第8章,香港:天道书楼,2006年。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36页。

③ 参见吴义雄《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④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0—98页。

⑤ 参见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西方教会组织本身的中国化现象也颇引人瞩目。如1912年圣公会各差会在上海成立中华圣公会总会议,1920年信义会各差会组成中华信义会大议会,1928年南方卫斯理宗也改成中华监理会等等。^①这些教派虽然仍为西方传教士所掌控,但中华领导人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该时期各差会联合建立的中华基督教会,是本色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华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简称C. C. C.)是由15个教派的华人教会共同组成的全国性的合一教会组织。该会以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为主,于1922年成立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1927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该会有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从上到下的行政机构,由全国总会—大会(或协会)—区会—一堂会四个层级构成,信徒数一度达到全国基督徒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华基督教会中华人领袖占据绝对优势,如参加1927年成立大会的88位代表中有66位是华人,会长为著名基督徒诚静怡。该会放弃原有的宗派思想,不分国界,以适合中国国情为出发点,以推动自传、自理、自养为己任,是真正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②

自传方面,曾先后出现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湖南逐家布道团、广东蛋民布道团、上海车夫听道处、福州旗族布道团、香港海面布道团、上海基督徒布道团、上海福音布道车等等,最具代表性的为中华国内布道会。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于1918年,但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会成立之初,发起人之一的胡素贞在香港联合新教各派信徒组织了协进部,同时医生刘汝刚和几个长老会信徒在河北地区也成立了协进部。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成立协进部80余处,主要负责筹集捐款、代为祷告等事宜。该会选举诚静怡、蔡苏娟、陈维屏等21人为执行委员,李琼皆为执行干事,对各项工作统一领导。布道会得到了新教各派广泛的支持,很快筹集到大笔资金。中华国内布道会最初的布教地为云南,1922年推广到黑龙江省,在哈尔滨成立协进部,中华布道会黑龙江支部建立,开始组织人力向黑龙江各地传教。1927年在黑龙江已经发展8个传教点,信徒近600名。^③

基督教教育方面,在社会各界收回教育权利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925年12月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该法令规定凡外国人捐资建立的学校须得到教育厅的立案认可,学校校长应为中国人,学校董事会中华人应该超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等等。面对这一法令,少数不愿接受政府条件的学校自动关闭或被勒令停办,而大多数教会学校接受了政府的立案要求。当时的教会大学绝大多数都在二三十年代完成了注册立案,教会学校在本色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种妥协也给教会教育带来了生机,1926年中国新教和天主教学校共有学生50万,

①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② 《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金陵神学志》1924年第10卷第3号(特号),第28—63页。

③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48—251页。

1937年则达到100万,整整翻了一番。^①

在基督教礼俗方面,教会人士开始修正曾引起中西文化冲突或带有西方文化专制意味的方针和举措,以促使其决策在现实生活中更为有效地施行,真正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为民众所接受。如基督徒的婚俗中中国传统成分占据了更大的比例,包括跪拜父母等习俗亦为教会所默许。^② 丧葬礼仪中送葬、出殡、扫墓等礼仪经过改造后获得多数教会的默许,原来被视为偶像崇拜的祭祖也不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③ 礼仪本色化也成为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基本趋势。

三、外患与内忧:战乱中基督教会的顿挫与抉择(1937—1949)

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虽然给基督教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同时也是一剂良药,刺激中国基督教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无论对中国社会还是基督教会都是一场真正的劫难,中国基督教遭遇到巨大的挫折。

沦陷区的基督教会所受的打击最为严重。日本通过种种手段全面控制了这些教会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利用日本教派及其教牧人员打入沦陷区基督教系统内部,在日本军政势力的策划和支持下,实现对原有基督教体系的控制和重组。

在东北地区,日伪扶持日本牧师山下永幸,于1936年12月1日在沈阳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该会有加盟教派13个,教会数达494个,其中教会数仅有15个的日本教派,满洲基督教会是整个联合会的真正领导者。1942年3月27日山下永幸的继任者石川四郎在长春西五马路教会组建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将东北基督教15个教派合并在一起,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日伪通过这个组织完全控制了东北教会。^④

在华北地区,集中控制中国教会的手段再次被采用,其过程同样不乏日本教会的参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西方传教士尽遭逮捕,华北教会为了应付时局,于1942年4月18日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日本人利用这个现成的组织,通过多次施压,迫使华北教会于1942年10月15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该团主理和执行委员虽然是中国教牧人员,但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和日本政界要人河野静士、武田熙亦参与其事,日本人是教团实际的领导者。^⑤ 在日伪的打压下,天津教会于1942年10月24日被迫改组天津分会和津海道区会为教团,成为

①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79—284页。

② 王治心:《本色教会的婚丧礼刍议》,《文社月刊》1926年5月第1卷第6册。

③ 参见邢福增、梁家麟《中国祭祖问题》,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年。

④ 李廷魁:《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十届监事扩大会议记录》,上海:中华基督教会,1946年。

⑤ 《成立概况》,《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北京: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本部,1944年。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天津分会,中村三郎等日本牧师任顾问。这样日本教会通过华北中华基督教教团,进一步控制了天津的教会组织。^①

除了以上两地区外,华东地区设立了华东基督教同盟和中日基督教协定会,西北地区组建了蒙疆基督教团,山东建立了山东中华基督教会,汉口成立了华中基督教团。这些团体组建的过程中几乎都有日本教牧人员的参与,可见日本教会配合日本侵略势力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体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后地区中国教会的处境也很艰难。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西方传教士都被关进集中营,西方教会资金接近中断,而兵火中生存难继的中国人很难为教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教会发展趋于停滞。迫于日军压力,从1942年起大批教会学校西迁,四川成都的华西大学中,迁入了来自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3000余人。此外,一些教会大学相继在重庆、贵阳、昆明等城市开学,当时在后方的教会大学学生总数达4000余人,连同教会中学学生总数共15万,比起抗战前锐减大半。^②基督教出版活动也受到很大影响。1940年由于纸张供应不能保证,《圣经》的印刷刊行成为难题。1941年底,沦陷区的教会出版和印刷机构几乎全部关闭,广学会和时兆报馆得以西迁,艰难维持。圣书公会决定到印度印刷《圣经》,但发行量非常有限。^③

面对外敌侵略,部分教会人士曾有过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的幻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基督教界出现过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但是到了卢沟桥事变以后,和平的幻想被打破,支持抗战成为中国基督徒的选择,大批基督徒参加到抗日战争的大潮之中。

首先,基督教会建立各种救助组织,对受灾平民进行救助。如“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男女青年会腾出会所和部分教堂作为难民收容所,对难民施行救济。^④“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会联合其他教会建立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共同推进难民救助工作。各地的青年会也纷纷行动起来,长沙青年会不但建立了大量的收容所,而且还开展难民职业介绍和职业训练工作,使他们能够自主地重建家园。^⑤其次,基督教会成立各种支持抗战的组织,为前方将士服务。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各基督教教派联合成立了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国难救济会、战事服务会等机构,推动当地

① 霍培灵:《沦陷时期的华北基督教团》,《天津文史资料》(第21辑),天津:天津政协文史委员会,1982年,第165—173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6页;另详见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第2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07页。

④ 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15页。

⑤ 李陵:《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抗战时期的难民救助工作》,《船山学刊》2005年第3期。

的抗日活动。青年会全国协会还建立了军人服务处,吸收了一批有志青年到前线为伤兵提供服务。再次,基督徒积极以财力和人力支援前线。抗战伊始,全国各地基督徒就积极响应捐款活动。如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上海青年会半个月就劝买十万元,超额完成任务。广州某主教捐出金十字架一枚。各地妇女也行动起来,竞相缝制棉衣并且捐出旧衣、毛巾等物,通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送往前线。^① 复次,教会不断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暴行,通过舆论呼吁外国力量支持中国抗战。如“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基督徒学生成立国难救济会进行抗日宣传,向国际友人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②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男女青年会等都联名致电国联,要求对日本实施制裁。^③ 中国基督徒的抗日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抗战取得了胜利,大批传教士开始返回中国,到了1947年底已经增加到3500人,分赴全国各地实施基督教复兴计划。^④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也于1946年7月从重庆迁回上海,并于12月3日召开年会。会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年奋进运动,运动目标为:增加信徒人数,加强教会力量,促进教会再度合一与合作,提高社区和国民精神生活。三年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9年信徒人数达83.5万人,比1936年的53.6万人增长56%;堂会6500间,同比增长27%。^⑤ 教会教育方面,各内迁学校迁回原址复学,准备筹集资金建立联合教会大学,扩大招收非基督徒子女入学,开展教育募捐计划。文字出版方面,开始印刷和发行《圣经》及其他福音书,广学会曾联络各基督教出版单位实施复兴计划。教会也开始利用广播电影等现代媒介展开传教活动。^⑥

但是,在政治上,西方传教士却显得保守甚至反动,其反共色彩日益浓重。随着时局的发展,1948年初,新教各方面开始策划应变和撤退计划:积极鼓励基督教内外的自由主义者;加紧培植中国神职人员;加紧农村教会的扶植;倾销《圣经》和其他书刊;适时转入家庭礼拜;重要教会档案、地契及有价证券转到香港;对教会财产清查登记。^⑦ 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曾召集各教会召开紧急应变会议。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西方差会体制下的中国基督教传教运动终结,中国基督教开始了一个新的乐章。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5页。

② 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第315页。

③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全国总会致电国联电文,见《为日军侵占东省事敬告全国教会书》,《真光》1931年11月第30卷第11号。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15页。

⑤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3页。

⑥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11页。

⑦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23—424页。